

中山大学名教授学术丛书

《梁钊韬文集》之一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 古代 巫术

梁钊韬 著

36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名教授学术丛书
《梁钊韬文集》之一

中国古代巫术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梁钊韬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梁钊韬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2

ISBN 7-306-00184-1

I. 中…

II. 梁…

III. 迷信术数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K25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34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1999. 11. 24

北京图书大厦

No. 0072994

序

《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乃已故梁钊韬教授早年研究之论著，他于1939年开始动笔，完成于1940年末。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存亡之秋，抗日前线上数百万英雄以血肉之躯，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精良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内地人民为着“抗战必胜”，茹苦含辛，尽全力支援前线。至于火线里里外外的人民，为着避开敌寇锋芒和屠刀，不断地流离迁徙，挨饥抵饿，亦毫无怨言。当时这一切，完全体现出中华民族庄严无畏的精神和不可被征服的气概。

这段时间，梁教授正处于二十三到二十四岁之年，他追随中山大学自广州搬迁至云南激江，又从激江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长期栖身于破旧庙宇，以残缺危房为书室。他为着维护中华文化的尊严，特以其所熟习的人类学理论，分析自己在抗战流徙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真实社会，结合其钻研中外典籍所得的资料，说明中国古代巫术以及宗教起源和发展诸问题，因而写成这本书。当时他所过的“研究”生活，实际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

我还记得于1944年6月，日本侵略军正向湖南长沙以南大举进攻，湘中、湘南、粤北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时我住在桂林东郊横塘村一家专收苗、瑶、侗、壮、彝、水各民族子弟为学生的学校——桂岭师范学校；这家学校的学生，也收到通知，疏散回各民族地区。桂林处于风声鹤唳之中。在这个时间，梁钊韬教授从粤北坪石疏散到湘南，辗转来到桂林，下柳州，入黔蜀。他在逃难途中，身无长物，仅有一张旧毡以及一大包他手写的书稿，就是这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原稿。

梁教授的轮廓和仪表，生来洁净端庄，斯文潇洒，但当他抵达桂林时，只见他经过流浪、辗转和饥饿，变得蓬首垢脸，而他仍不忘保存其对中国古代文化探索所写下的长篇论著。他宁愿饱尝旅程的艰辛和不便都要保留这一大包凝注自己大量心血的书稿，其爱惜文化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以后，梁教授回到中山大学任教，这本以草纸毛笔书成的书稿逃过历次烽火和浩劫，收藏至今，足有半个世纪之久，更值得珍惜。

梁教授为人类学事业奋斗终身。尽管于1949年11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所设的人类学系被裁撤，合并到历史系或生物系里去，但是梁教授在中山大学仍坚持

着，把人类学中所包含的考古学、原始社会史（史前史）、中国民族志之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担负起来。使人类学的科学原理得以持续下去。一直到了1981年初，在“开放”形势之下，他就中山大学所具备的条件，重新创办人类学系，中断了30多年的这项专业课程，再被建立起来。他为中国人类学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几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南方广大民族地区。许多高山峻岭，竹棚茅舍，曾留下了他的脚印和身影。30年代末，他调查过云南抚仙湖湖口区苗族，40年代前期，他曾集中研究粤北瑶族；50年代前期、中期，他着力研究海南岛黎族，并于1957年夏指导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对五指山区里里外外，进行民族考古调查，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建立，奠下了基础。50年代末期，他又率领几个研究生到滇西山地探索当地民族文化，70年代初期，他更探索西南太平洋的民族与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关系；80年代中期，他又在藏族地区，指导他的藏族博士研究生格勒研究藏族的起源和文化，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格勒所写的《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一书，长达447 000余言。这本书原稿，自始至终是在梁教授细心指导下，才得以写成，这本书不管是理论或资料，都凝聚着梁教授大量心血。仅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梁教授爱护和培养后辈

的热情。

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 1958 年，广东曲江县马坝乡农民发掘磷肥原料时，在当地狮子岩挖得大批动物化石，梁教授以其敏锐的眼光，深厚的学养，辨认出其中有几块是古人类的残缺的头盖骨。这些残缺的头盖骨，就是今天闻名世界的马坝人头盖骨。马坝人实际是由梁钊韬教授发现的。

梁教授不幸于 1987 年 12 月 2 日凌晨，以胆管癌发作病故。1989 年中山大学为了纪念梁教授对人类学事业艰苦开拓所作出的贡献，特将其早年著作《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交给出版社公开出版。现在这本书要重新排印，出版新的版本，特草成这篇短文，向读者说明本书的由来以及本书作者写作时所处的环境，以纪念梁钊韬教授奋斗的业绩，是为序。

张寿祺

1990 年 2 月 3 日

写于珠江之滨

哲人已逝 业绩长留

——梁钊韬教授生平业绩

梁钊韬教授，我国人类学开山大师之一，是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教育学家。

一、矢志力学从教、早年学业有成

梁先生名钊韬，字勉之。1916年6月生于广东省顺德县高辉乡北头村。先生之父梁卓庭是当时广州的第一大煤商，勤勉实干，经营有道，家业甚厚。先生之母余琼玉虽为继室，但入过私塾，知书识理，勤劳慈惠。她对梁钊韬先生的成长起着很好的作用。梁先生少年时，其父目睹官僚腐败，民族不振，商途艰险，常教诫儿子长大“一不做官，二不经商，而应矢志力学从教”。先生之母亲也要他依学制就读学校，并勉励他刻苦攻读，将来为国效力。梁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之有今日，完成我国学制中的一切阶段，实以吾母坚持为关键。”在双亲的谆谆教诲下，先生毕生都矢志于学业，致力于教育。

梁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国家多难，民不聊生，求学

的道路是十分艰辛曲折的。

1935年，梁先生考进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37年转中山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他怀着深造的愿望，更加勤学苦读，又能得到诸多著名学者的教导。特别是在著名的考古学家郑德坤教授及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的影响下，梁先生不仅深深地爱上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而且希望探求以史为鉴，解答社会问题的途径。尤其是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抗战军兴，政局混乱，先生回忆当时的思想是“以历史上朝代兴亡比于家庭成败，内外家族之盛衰了如指掌，甚有所感，故益加奋勉，慎思潜读”。当大片国土被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时，先生目睹敌人的飞机在广州上空狂轰滥炸，日寇四处烧杀掳掠，益加愤恨。际此硝烟弥漫、兵荒马乱期间，梁先生奋笔疾书，写了题为《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的文章（载《更生评论》4卷2期），以战争的正义非正义来论证“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要在这不合社会思想条件下而失败”；文中还反映了先生对社会主义的朦胧认识，先生认为“社会主义者反对黩武主义，但又主张御外侮的自卫行为，社会主义者应与中等阶级组织联合战线共御大敌，成立国际民主阵线与之对抗”。表现了先生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感和行动。

梁先生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这与

在大学期间受到著名的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民族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哲学史家朱谦之教授的多方指导分不开。特别是杨成志教授的学术思想以及治学方法对梁先生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杨成志教授坚持人类学家必须长期持久地进行田野科学考察，必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抗战期间，“在我们自己偌大的国土上，已经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向内地西迁，初至罗定，继而迁至广西龙州，最后定址云南徽江。先生等跟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先生仍坚持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不少有关民族学的历史、语文、民俗、歌谣等资料。这一时期的实践，为先生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确立了很好的基础。

梁钊韬先生大学毕业后，一种炽热的爱国情感，强烈的求知欲以及“成一家之言”的心愿驱使他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课程，继续深造。此时，正值其家道中落，但先生“律己颇严，从不浪荡”。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精心指导下，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原始社会史以及宗教学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梁先生读研究生期间，1940年秋，中山大学开始由徽江迁回粤北坪石。杨成志教授乘此机会，于1941年率领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等人再度深入粤北

瑶山对瑶族的一支“过山瑶”进行调查研究。梁先生不畏艰苦，深入村寨，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写了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发表在《民俗》季刊1943年第2卷），文章精僻地分析了瑶族宗教的实质。指出瑶族宗教的主要特质“是精灵崇拜，有灵崇拜和妖物崇拜，而并非是道教”。梁先生在读研究生期间，对我国古代巫术、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朱谦之教授的指导分不开。朱教授是先秦哲学史家，熟读古代经典名著，梁先生在朱教授的指点下，刻苦攻读《十三经》注疏。笔者自1981年来人类学系任教，曾闻先生多次谈及《十三经》注疏对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史的重要性。梁先生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便大量运用《十三经》注疏的材料。先生这部著作虽然在成为四十多年之后才出版，但至今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该书一出版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著作观点的创新，方法的独特，材料的翔实，也足以说明梁先生学习的勤奋，学业的治厚。先生不但学业有成，而且从此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为之奋斗了一生。1941年，梁先生在中山大学圆满完成学业，获得硕士学位。

二、竭心栽桃李，毕生为教育

梁钊韬先生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就是教书育人，他在教育这个园地上辛勤耕耘了42年，竭尽园丁之劳，为国家为人民培育了大批的人才。先生还兴资办学，呕心沥血复办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梁先生不愧为教育家，这也是他一生的光辉业绩之一。

梁先生毕业后留校任社会学系讲师，1942年，由校长许崇清举荐任广东省政府指导委员会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任职期间，梁先生曾多次赴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视察边政。撰写了反映排瑶政治、经济、争斗、婚丧的论文《上峒瑶民社会》（载《大同杂志》第1卷第2期），试图解决当时瑶区的边政教育问题。

1944年梁先生经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教授的推荐，任该馆助理研究员。后升任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任职时间虽不长，但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设立了民族学研究室，以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同时主编《西南民族志》，搜集了200余万字资料。先生在此期间，研究成果甚丰，在《中山大学学报》、《民族研究集刊》、《边政公论》、《文史杂志》、《广东建设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中国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

等方面的论文十余篇。先生在华西大学工作期间深入西南地区进行民族、民俗方面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这对其以后的教学与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梁先生返回中山大学任社会学系讲师。1948年秋，中大成立人类学系，先生又经杨成志教授举荐任该系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中大的人类学系被撤消，梁先生转调到历史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及考古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78年后，我国教育和科研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经梁钊韬教授积极筹划和争取，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系。梁先生任系主任，主持人类学系工作。

梁钊韬教授作为教育家，首先即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率先垂范于后人。他经常对教师和同学们说，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作为人类学家，要多到现实中去寻找第一手材料，自己调查得到的材料，更为可贵。”这也是梁先生自己治学的基本原则。在他的论著中所用资料都经过查对来源，认真核实，而且尽可能将有关资料作较全面的处理。这使他的著作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资料翔实，科学性强。梁先生作为人类学家，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始终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要有田野的实践；光有空洞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而只有调查得来的材料，

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综合，揭示客观规律，也是没有用的。他从22岁在中大读本科时开始直到晚年，几十年中进行过许多次的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田野考察研究。他跋山涉水，不辞辛苦，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海岛边陲。1952年暑假，梁先生率领中南历史文物小组到海南岛五指山区，为了进行文物搜集工作和黎族社会研究，从海岛的西南至东北，横贯黎区，步行几百里，每天翻山越岭，深入黎家村寨。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对海南岛民族分布现状，黎族社会发展以及黎汉两族的相互影响等作了较详细的了解。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把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写出了《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这篇很有见地的论文。象这样艰苦的实地调查，不知经历多少次。1963年夏天，他参加广东省博物馆在广东南海和增城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墓群的发掘。同年冬天又带领他指导的研究生和助教，穿越云贵高原，赴滇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途程万里以上。经历五个月时间，先后考察了西盟佤族、澜沧拉祜族、碧江怒族和傈僳族、福贡独龙族、德宏傣族、景颇族和崩龙族、大理白族等，获文字记录材料约18万字，拍摄有关照片200余张，并搜集了一些民族文物。梁先生撰写的《滇西有关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材料初释》就是以这次田野考察作为基础的。

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表现在课堂教学上。他认为，作为一名称职的老师，讲每一节课都要对学生负责。他说：上一节课，如同演一出戏，“台上一分钟，台下三年功”说的是演戏，也同样适用于上课。我们上每一堂课，除了观点正确，内容充实之外，首先要熟悉“台词”，对教材要熟悉，最好不看讲稿，或少看讲稿，纲目要十分清晰，板书的位置都要事先考虑好，最重要的是让人听懂；其次，要讲究表情、语调，要使人爱听。梁先生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尽管他有长期的教学经验，所讲授的课程也讲过很多遍，但他每次都认真备课，写出详细讲授提纲。同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力求把内容讲活，使之富有启发性。他善于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启发学生钻研问题，分析问题逻辑性强，论证深入。他讲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课程，内容比较枯燥，但学生爱听，能从中得到很大的收益。他编写了不少教材，质量都很高。其中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等被高教部列为全国高校交流教材。

作为教育家的梁钊韬教授，另一表率就是悉心培养下一代。他总希望弟子们的学术造诣能超过自己。他说，学生超过老师是一种好现象，“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样一代胜于一代，中华民族的前途很有希望。梁先生培育人才在于他甘为人梯，奖掖后进。他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经常给教师们介绍国内外

人类学的学术动态，讲述自己教学科研工作的体会。为帮助青年教师备好课，甚至连自己的手稿和珍藏的资料都无私地提供给他们参考使用；将专业书籍借给研究生、教师更是十分平常的事。梁先生指导中青年教师写论文，编写讲义更是耐心细致，没有保留。因此，很多教师都说，梁先生对青年的指导和帮助是无私的、慷慨的。

梁钊韬教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其最突出的贡献是复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系。他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深感中国应该开展人类学研究，应该培养自己的人类学家。梁先生认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多民族的文明国家之一，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学”。在办系的指导思想和专业设置以及课程结构方面。梁钊韬教授全面分析了国内外人类学的情况，汲取我国和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解放前后相同或类似专业的办学经验，借鉴苏联和西方一些国家有关经验，并广泛征询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论证，从而提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四个学科相结合，即把文化人类学（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结合起来，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系的主张，并全力付诸实践。从筹备办系开始，到把系办好，梁先生都躬亲其事。他亲自向学校和教育部写报告，充

分论证社会主义的中国需要人类学；他亲自调配系领导班子，物色教师；他亲自设置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安排课程，组织教材。总之，办人类学系，白手兴家，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为办好人类学系四处奔波，亲力亲为。今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已颇具规模了。拥有几个学科构成的较强的师资队伍；设有人类学博物馆，设立了三个教研室，一个研究室，二个实验室和一个图书资料室；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各种层次的人类学专门人才。梁钊韬教授亲自培养了16名硕士生和4名博士生，其中获我国藏族第一位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格勒，不仅已成为我国藏学研究工作骨干，而且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为国内外有关学术界所瞩目，国外不少报刊报导中大成立人类学系，有的学者赠送图书资料，有的学校派来留学生，或派专家来交流。他们认为“中大的人类学系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系”。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载入了梁钊韬教授的名字，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称梁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卓越的贡献。”正如美国传记协会主席J·M·伊文斯教授在给梁钊韬教授的贺信中所说，“这是您受世人公认的突出贡献而获得的荣誉。”对于这一赞誉，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梁钊韬教授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一颗赤诚之